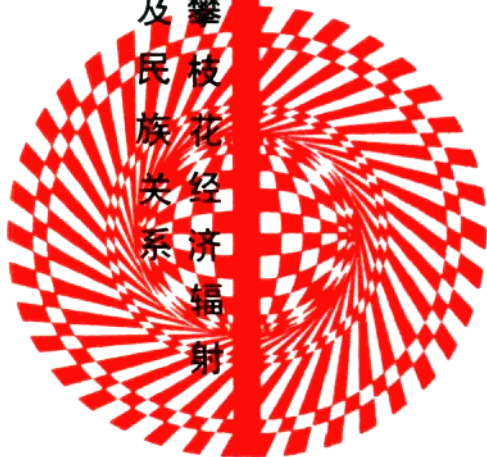


● 李星星 罗 勇 执笔

攀西裂谷上的

生长点

攀枝花经济辐射
及民族关系



● 《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课题组 ●

版社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不足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但民族地区的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以上。改革开放是我国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将由此走向共同繁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自然离不开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充分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使之与全国经济协调地发展，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本身，而且也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西部地区。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与东部的差距拉大。这种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也包含着民族的差距。尽快地缩短这种差距，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攀枝花市地处我国西部四川的西南边沿并与云南相邻，是从1965年起兴建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有“四川钢都”之称。攀市的建立源于该地有着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煤矿及水力资源。攀市钢铁基地的建立已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攀市又属民族地区，其辖区3区2县面积7434平方公里，主要由凉山彝族自治州（当时属西昌地区）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划出组建，全市有26个民族乡，有少数民族11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1/4。同时，攀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由于建设的需要，全国各地的人才在当时的条件下统一调配支援攀市，攀市现有人口94万，其中城市人口48万，而城市人口中有98%是外地的移民及其后裔。这样一个建立在西部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新兴工业城市，如何发挥其经济优势以带动周边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对于缩小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具有典型的意义，这已成为

举世瞩目和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攀市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尤其是在大中型企业帮助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值得称赞的新路，前景喜人。对于攀枝花城市的发展及其带动周边的途径，我们称之为“攀枝花模式”^①。本书可以说是对这一模式所进行的一次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探讨。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在“七五”期间就意识到西部边远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从1984年开始即将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从沿海转到内地，从东部转到西部，从汉族农村和集镇转到少数民族地区。他亲自牵头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民族地区及边疆发展研究》，力图从深入的调研中找到民族地区与边疆发展的切实途径。该课题在列出的重点调查研究对象中，北方的包头钢铁基地与南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费老即嘱咐笔者应注意攀枝花大工业的辐射与民族关系的问题。为此，笔者曾几度赴攀筹划这一研究。在费老的关心下，由笔者负责的《攀枝花市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调查研究》于1990年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此后，由笔者负责的相关课题《攀西开发在发展西南经济中的作用》又被列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因之，可以说这两个相关课题总的思路都是根据费老的设想提出来的。

1990年5月，费老一行亲赴攀西地区实地考察，9月在《瞭望》周刊上他发表了关于开发攀西问题的文章^②。此后，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详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访问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攀枝花市以后提出的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也是从区域发展入手来推动民族发展的例子。我建议由彝族主要聚居区凉山的中心西昌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联合建立攀西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

① 李绍明、李星星：《民族地区建立大工业城市的反思》，《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期。

② 费孝通：《凉山行》的上、中、下，分载《瞭望》周刊35、36、37期，1990年。

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这可简称为‘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一点’就是指攀西地区,它资源丰富,能源充沛,是对今后开发大西南具有强大启动作用的经济心脏。针对当前该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提出‘四个结合’的对策: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民族结合。‘一线’是指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由我国大西南通往缅甸印孟的一条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成一片,这就是我们设想中所提的‘一面’。经济的辐射作用将波浪式由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从凉山地区向四周扩散到大西南的整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包括川滇黔三省,即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使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①

费老这些关于建设攀西开发区的设想与以往仅从资源开发来推动攀西的建设有所不同,既见物又见人。关键在于必须充分调动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处理好“四个结合”的关系,才能使攀西的开发步入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在大西南的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攀枝花地处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可说是我国最接近东南亚和南亚的唯一的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大工业城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振,其经济辐射的作用必将与日俱增。

攀枝花建市 30 年来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92 年底四川省又作出建立攀西资源开发区的决定。这个开发区包括攀枝花市的全部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部地区。幅员面积 2.96 万平方公里,人口 280 余万,其中少数民族 50 余万,经过努力,攀西地区将成为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原材料基地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攀枝花经济辐射的必然结果。这同时意味着在建立攀西开发

① 费孝通:《边区开发论著》的《前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页。

区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里的民族关系。

本书即是根据上述思路,在接受国家与省的任务后,由课题组通过几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全书采取社会学与民族学宏观观察与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方法,力图客观反映出攀市建市 30 年来在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方面的成就、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全书的主要观点是在研究中形成的,均在课题组内经过反复讨论并取得共识。但这仅代表一种看法,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课题组由下列人员组成:组长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员有冉光荣(四川联合大学)、韩宗山(攀枝花市政府)、卢玉龙(中共攀枝花市委)、张宽岩(中共攀枝花市委政研室)、邓耀宗(攀枝花市文化局)、李朝中(攀枝花市民委)、李星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罗勇(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张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王成孝(攀枝花市文化局)等同志。

课题组自 1991 年以来先后在攀枝花市及其所属区县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承蒙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书稿写成后又蒙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孙本光、攀枝花市长秦万祥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意。

本书由李星星、罗勇两同志执笔写成。李星星执笔上篇前 5 章及下篇第十、第十一章;罗勇执笔下篇第六至第九章。最后由李绍明审定。

值此攀枝花建市 30 周年之际,谨以此书作为这一重大节日的献礼。

李绍明

1995 年 1 月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李绍明
-----------	-----

上篇

第一章 攀枝花建设方式	(3)
一、中央决策	(6)
1 决策背景	(6)
2 决策过程	(12)
3 决策评价	(16)
二、建设攀枝花	(21)
1 前期准备	(21)
2 大规模建设	(23)
3 特殊建设方式	(27)
第二章 攀枝花城市模式	(37)
一、嵌入环境	(37)
1 自然地理	(37)
2 历史建置	(39)
3 古道要津	(41)
4 民族走廊	(42)
二、城市形成	(44)
1 生长阶段	(44)
2 新兴城市	(46)

三、模式特点·····	(48)
第三章 生长及转换 ·····	(52)
一、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	(52)
二、攀钢发展阶段·····	(56)
第四章 工业辐射和城市吸引 ·····	(65)
一、辐射源·····	(65)
二、“特化自然经济”·····	(69)
三、辐射、反应、辐射圈·····	(74)
1 辐射及反应·····	(74)
2 辐射圈·····	(78)
第五章 民族关系 ·····	(80)
一、历史变迁·····	(81)
二、民族共建·····	(85)
三、现实特点·····	(88)

下篇

第六章 贫困陷阱 ·····	(96)
一、贫困状况·····	(96)
二、陷阱要素·····	(102)
三、扶贫效应·····	(110)
个案(1):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的贫困·····	(121)
个案(2):攀钢扶贫帮乡·····	(128)
第七章 “飞来户” ·····	(136)

一、流动人口	(136)
1 原因和时间	(136)
2 作用 and 影响	(139)
二、“飞来户”	(142)
个案：洼落彝族乡的无证迁移	(147)
第八章：农业转换	(153)
一、农村的形式变换	(153)
二、科技兴农	(157)
三、立体农业	(163)
四、开发性“三高”农业	(166)
个案(1)：李氏“庭院经济”	(172)
个案(2)：独树村水果业	(174)
个案(3)：吉氏果园	(177)
第九章 异军突起	(180)
一、发展阶段	(180)
二、企业的类型	(185)
三、制约因素和启动特点	(190)
个案(1)：平地的选择	(198)
个案(2)：红宝锁粉厂的教训	(203)
第十章 农村市场	(209)
一、传统集市	(209)
二、“大市场”带动小市场	(215)
1 改革前的商业	(215)
2 向市场经济转换	(220)
个案(1)：普威集镇	(226)
个案(2)：大坪子集市	(230)

个案(3):鱼塘乡市场建设.....	(234)
第十一章 福田样式	(237)
一、民族、历史.....	(238)
二、农业经济	(242)
个案(1):胡明藻户.....	(246)
个案(2):李发元户.....	(247)
三、乡镇企业	(250)
四、市场开发	(257)
五、教育、文化.....	(258)
六、发展模式	(266)
主要参考书目	(274)
后 记	(276)

上 篇

第一章 攀枝花建设方式

几百年前，当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世界的东方还处于封建制度的桎梏中。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采用机器大工业而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更为强大的生产能力。从那个时候起便开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工业化进程。

如果说，在 19 世纪，农业中国在来自西方的工业生产力的挑战面前，还显得十分傲慢或迟钝，封建专制政府既无意亦无力承担起实现民族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那么，到 20 世纪，中国则奋起大批民族精英，挺身迎接挑战，决心顺应历史潮流，推翻旧制度，把贫弱不堪的封建农业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在本世纪初的那个年代里，谁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到民族独立，谁就将被决定承担起实现中国民族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历史的选择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工业化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定，也是世界所有落后的民族、国家历史的基本规定。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然而，要在黄河、长江贯通的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工业化，谈何容易，而要求在短时间内即实现国家工业化，更是困难重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之深厚，资本主义经过百年的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工业成分所占比重仍很微小，而且主要分布在远离内陆的沿海一带。本来就极不发达的交通运输因战乱更是千疮百孔。数十年的战争和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搞得“一穷二白”。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人接管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贫穷落

后并惨遭战争蹂躏的农业大国。这是决定开辟中国特殊的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基本点。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此，毛泽东曾多次估计，中国从建国算起，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时间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

世界历史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民族工业化可能采取各不相同的方式。有些国家可以靠大量的外援或外国资本的扶持来获得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而中国当时除了得到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限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外，必须主要依靠自己迅速提高经济力量。为此目的，历史所能够提供的手段，只有国家权力。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二是“严重的经济任务”，从而提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建设强大的经济。

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决定了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依靠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以便迅速、有效地动员和集中所有的人、财、物力，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目的。中国工业化是否能够迅速完成，关键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控制方式以及相应的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严密的政治管理机制，而且，在长期的斗争中锻炼出非凡的组织才能，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化管理经验。唯一不熟悉的是城市经济管理和操作现代工业，而这方面的经验则是由苏联提供的。

一般而言，一切后进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都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通过某种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控制手段，加速实现民族工业化。事实证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运用上述措施以

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不仅恢复了被战争摧毁了的国民经济,而且以极大的工业成就完成了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渡时期。

如果说,作为外国资本势力最早渗透的地区,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还多少分布着一些现代工业的生长点,那么,中国的纵深地带,中国的西部,则是一片空白。中国西部自然地理制高点的工业空白,与东部低海拔区的工业制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时时伴随在人们心里,而对工业化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现代工业生产力打入的沿海地带人口稠密而工业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相反,中国的“西半天”却是人口稀疏而工业资源颇为富集的区域。仿佛老天着意如此安排,总是把宝藏埋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不待时机成熟,不待人类需求迫切之际,绝不显露出来。在工业时代尚未起始,工业生产力尚未来临之时,现代工业所需要的种种自然资源,在荒凉的西部地下静静地等候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依附于这片土地,眷恋着她的养育之恩,却不知道她内部蕴藏着属于未来的巨大潜能。人们守着这块藏宝之地,从事着依赖自然循环的传统生产,被贫穷困扰了数千年。

本书主题——攀枝花,就是“西半天”里这样一个属于未来者的“聚宝盆”。在人类诞生数亿年以前,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力量在现今我国西南川滇交界地带,造就了一条南北长约300余公里,东西宽约100余公里的大陆裂谷带。并用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在这里制造出足以让工业享用一阵子的富集的资源。这个堪称罕见的“聚宝盆”,其资源富饶程度可以压倒久负盛名的东非大裂谷和欧洲莱茵裂谷的裂谷带,就是本世纪80年代才得以正式命名的攀(枝花)西(昌)裂谷。攀枝花就处于攀西裂谷的中南段,而且是这条裂谷带成矿条件最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然而,攀枝花并不仅仅是以其富集的自然资源而闻名于世,其引人注目并使人欢欣鼓舞的,还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在这里得以展现——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扩张,终于把触角伸到了这片沉睡的地带,终于在地球上又抹去了一点空白,终于在荒凉的中国西部楔入了一个

现代工业的生长点。

攀枝花的开发和建设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把工业导向纵深,不惜代价地在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崇山峻岭之中建立像攀枝花这样的现代工业基地和非传统的新型城市,这种独具胆识的举动,既出自雄才大略之手,又是基于当时环境条件而作出的一种重大抉择。

攀枝花建设的决策使现代工业生长点在大西南殖入了一种经济文化不同质的环境之中,就像来自西方的工业生产力打入中国传统农业环境之中一样。并且,一经殖入,便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在短短的 30 年时间里,一个具备极大生产能力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便在西部崛起,并在“不毛之地”上耸立起一座拥有 50 万人口、潜藏强大辐射能力的新型工业城市。

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起初似乎是倔强地、孤立地生长,尔后便逐渐显示出扩张和整合环境的端倪。那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布点,不仅仅是一个基地,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一种强大的经济方式,一种新型的文化,一种要求伸长的并覆盖其环境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源泉。

中国民族工业化道路既具有世界普遍性,又有中国特殊性。以特殊方式进行的、体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攀枝花建设,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攀枝花建设不仅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缩影,甚至也是世界后进民族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一面镜子。

一、中央决策

1、决策背景

近现代一切后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民族独立是大

工业生产力在全球普遍化并得以最终完成的一个条件。领导实现国家、民族独立的，无论是哪个阶级或政党，都被历史赋予了完成民族工业化的使命。

由特定的历史规律所支配，所有后起的民族独立国家，都将通过某种变异或特殊的形式，避免简单重复传统资本主义的演进道路，而使社会经济发展加速或发生跃进。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后进国家所走的特殊的工业化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身负双重历史任务的性质要求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以实现历史的跨越。早在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开国以后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的确定反映了工业化世界要求的深层时代背景。而中国所选择的特殊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及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攀枝花建设开展以前的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特殊进程以及最高领导层的相关决策，有必要作一番扼要的回顾，以了解其基本线索。

在新中国建立及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苏联建设经验的模仿。一个缺乏现代工业的农业中国要想迅速增强国力，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为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建国初期，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有必要增强国防力量以保卫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这也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毛泽东曾指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它能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动力，是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试问：“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中国，何以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引进

对我国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基本上按照苏联计划模式制定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质上是发展重工业的计划，而且比起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重点是强调更高度的重工业发展。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牺牲一些当前的利益，建设重工业，是共产党“施仁政”的重点，是为人民谋取长远利益而施行的“大仁政”。

由于我国是一个主要靠农业生产支撑的大国，农民占居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国家工业化又不可能指望建立在对外国投资的依赖之上。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即成为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关键。而这需要本来就很贫穷并且在千百年来的贫穷中磨练出极富吃苦耐劳能力和精神的中国农民，作出巨大的贡献。面临这样的困难，毛泽东选择了非传统的道路，即在“强大的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化的前提下，先实行农业的合作化，以提高农业社会化的水平。在毛泽东看来，农业集体化既能够更大程度地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又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农民的压力，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是二者兼顾的唯一出路。

、“一五”计划完成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提醒人们对农业引起高度重视。虽然，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普遍反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确定“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但是，毛泽东的提醒已经起了作用。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毛泽东这几年来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忽视这两者，